

中国新世纪文学的 反思与建构

ZHONGGUO XINSHIJI WENXUE DE
FANSI YU JIANGOU

房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新世纪文学的 反思与建构

ZHONGGUO XINSHIJI WENXUE DE
FANSI YU JIANGOU

房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世纪文学的反思与建构 / 房伟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5161 - 1949 - 5

I. ①中… II. ①房… III. ①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802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周小丽
责任校对 张玉霞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0.5
插 页 2
字 数 163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总论 新生活视野下的新世纪文学的现代性	(1)
第一章 新世纪文学的内在文化逻辑	(7)
第一节 生成语境：文学的经典化及其困境	(7)
第二节 生产策略：文学体制与作家身份认同	(13)
第三节 焦点症候：原创力的缺失与寻找的焦虑	(22)
第二章 复古与创新：新世纪诗歌的发展轨迹	(30)
第一节 形象的沦丧与书写的难度：消费视域下的新 世纪诗歌	(30)
第二节 被剽窃的冲动与被强暴的表达：对底层诗歌的质疑	(35)
第三节 地方性书写：新世纪山东诗歌的审美嬗变	(42)
第四节 浪漫的继承：石灵的十四行诗解读	(47)
第五节 史诗化倾向：新世纪的“海啸诗歌”现象	(50)
第六节 古典主义转型：《习经笔记》与新世纪诗歌的 传统想象	(58)
第三章 新世纪小说的多元化发展	(68)
第一节 新世纪小说革命叙事的三张面孔	(68)
第二节 独特的“中国经验”：评赵德发小说《双手合十》	(83)
第三节 从张悦然的创作看新世纪 80 后文学走向	(91)
第四节 破裂的概念：来自《兄弟》的症候式分析	(104)

第四章 众生喧哗的新世纪影视文学	(118)
第一节 中国新世纪电视剧中的民族国家叙事策略	(118)
第二节 新世纪语境下的《武林外传》的江湖世界	(126)
第二节 《鬼子来了》：殖民地微观政治学的奇观与误读	(137)
第三节 赵本山的小品帝国与政治农民神话	(147)
第四节 《太阳照常升起》：后革命语境下的浪漫狂想	(159)
 后记	 (166)

总论 新生活视野下的新世纪 文学的现代性

现代性是缠绕中国文学的重要命题。它脱胎于有关现代、现代化等概念，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解读中国文学的阐释角度。进入20世纪90年代，有关现代性的思考，又与后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近代性等相关话语缠绕不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话语的溢出与失控。有的论者认为，现代性已终结，中国进入后现代时期^①，而有的则认为中国刚进入现代性门槛，中国现代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说，还是一种近代文学^②。而王德威等学者，则将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进行了更细致的研究，提出“晚清被压抑的现代性”等一系列富有创意的命题^③。有的则从宗教与现代性发生的关系入手，强调现代性资源的中国稀缺性^④。有的则受到卡林内斯库等外国学者的影响，强调文学审美现代性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系。有的则更富于“左”派批判意味，强调现代性问题的中国特质，认为中国自“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具有“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气质^⑤。进入21世纪以来，对于新世纪文学和现代性的关系，也是众多学者阐释的焦点之一。

对此，张未民先生的《中国“新现代性”与新世纪文学的兴起》一文，另辟蹊径，用“生活现代性”，来总结并概括现代性问题的中国的特殊经验性。他认为，这种生活现代性，是中国现代性发生阶段，最早出现的现代性品质之一，中国现代性话语的生成，存在宏大叙事性、精神

① 参见王宁《后现代主义之后》，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 杨春时、宋建华：《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转引自《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1997年第4期，第95页。

③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④ 参见刘小枫《拯救与逍遥》，2001年7月版，《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1998年2月版。

⑤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

性偏执、本土性的缺失三个特点，这是很准确的。而他将现代性分为启蒙现代性和民族国家现代性、生活现代性三个方面，来阐释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特殊性，并赋予了生活现代性独特的中国语境内涵，更是具有创新意义。正如张未民所说：“从这种民生的现代性角度看，由于民生问题最直接地与人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方面相联系，因此我们所说的这种生活现代性，首先便意味着物质的现代性，经济的现代性，富国强民的现代性，这成为生活现代性的基本维度。应该指出，这种现代性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由于其人（国民）的基础性世俗性价值尺度的缘故，乃是中国现代性话语及其实践面对西方现代性挑战的最早和最优先、最基本的内在动机。”^①可以说，这种生活现代性，既是现代性发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又是后发现代处境下，半封建半殖民的中国实现文化现代转型的必由之路。它包含人的物质待遇上的尊严，欲望与人性解放的关系等诸多命题。同时，张未民又将这种新生活现代性的品质，与新世纪文学的概念相联系，将“新世纪”从时间性概念，变成了一个“生活现代性”意义上的社会性概念。

我认为，“生活现代性”概念的意义，就在于它的“中国特性”，特别是针对中国现代性发育的错位和悖论的状态而言。这里，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生活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作为“宏大叙事”，现代性中的启蒙叙事，已天然包含以物质欲望为诉求的人性解放观。而这一点，正是西方文艺复兴从“神”的禁欲恐怖中，将人类解放出来的最初动力。在启蒙学说兴起的过程中，对人性欲望的肯定，始终是启蒙的基本教义。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人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的状态，而不成熟状态即没有别人的指导就无法运用自己的理智。如果不是因为缺乏理智，而是因为未经别人指导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加之于自己的。”^②所谓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指的就是将“自我”放在中心位置，张扬个性，自己运用理性来指导自己，摆脱上帝威权，勇敢追求幸福和财富。17世纪思想家霍布斯认为，人类的核心事实就是“人具有至

① 张未民：《中国“新现代性”与新世纪文学的兴起》，《文艺争鸣》2008年第2期。

②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7页。

死不止的追求权力的躁动不安的欲望”。在新教伦理中，也认为创造财富，在尘世建立功业，恰是灵魂得到拯救，进入天国的必要条件。创造财富便是荣耀上帝^①。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全部人类唯一真正普遍共有的价值观，都是纯功利性的——食物、住居、物欲的满足、财富与权力。”^②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西方曾出现过《巨人传》、《十日谈》、《鲁滨孙漂流记》等大量鼓吹凡人幸福，追求财富和自由的小说。而这种倾向，与有着宗教道德激情的高调启蒙，卢梭式的将国家民族与个人捆绑在一起的集体主义启蒙，有很大区别。而在启蒙叙事发育过程中，这种物欲，渐渐走向了人本性的反面，并激发了审美现代性与物质现代化的分离，物欲与精神诉求的分离，而物质技术的专业化则导致中心价值的解体，甚至形成了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艺术反拨。

由此，我们看到，作为现代性的内在要素，作为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活现代性”的重要性，的确没有在文学研究领域，引起我们充分的重视。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有着“耻谈功利、崇尚道德”的思维习惯，而自“五四”以来，中国救亡和超越他者的焦虑，都让我们接受的启蒙思想，主要来自卢梭、罗伯斯庇尔的激进集体主义启蒙，而不是拉伯雷、博马舍、伏尔泰、伯克、潘恩、霍布斯等鼓吹凡人幸福，特别是“物质幸福”的启蒙。在中国的现代性发育过程中，科学理性精神、物质欲望，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始终没有成为现代性的主流话语标准，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奏中，启蒙的精神超越性，民族国家叙事的天然合法性，都使得这两者的结合，中国现代性，呈现出集体性压倒个体性、道德性压倒物质性的“反现代性”的审美特质。

因此，20世纪80年代启蒙文学的一大缺陷就是，在吹响人性解放的号角的同时，它的道德化、伦理化倾向，仍十分严重。当阶级斗争英雄，变成了知识分子英雄，人类的欲望，特别是那些世俗化欲望，依然是一种“原罪”行为，例如张炜小说《古船》中的隋抱朴，作为一个思辨理性主体，有着深刻的思想，但面对爱情与功利的欲望，他反而不能如隋

^①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China Soci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Chengcheng Books, LTD, 1999, pp. 162—163, 转引自卢风《启蒙之后》，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页。

^② 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

见素般勇敢，只能怀抱着原罪的忏悔，躲在磨坊里苦读《共产党宣言》。而在张贤亮的《绿化树》系列小说中，性欲，只能成为男性主体自我反省和自我放纵的矛盾心理调节器，而最终以“女性牺牲”情节，作为男权神话仪式的祭品。而从另一角度讲，20世纪80年代后，《李顺大造屋》、《乡场上》、《陈奂生上城》等作品，则第一次在当代文学中，理直气壮地将人的物质幸福追求，作为叙事的核心意图。而从汪曾祺的小说《受戒》人性欲望的悄悄萌动，到王朔对于革命叙事的反讽，以及对物质欲望直言不讳的追求；从余华、格非、莫言、苏童等作家，对人类各种古怪欲望和感觉的发现与重述，到林白、陈染、王小波、贾平凹等作家，对于性意识的解放与狂欢，新生活现代性的影响逐步显现出来。

然而，更为悖论与复杂的情况在于，新时期至新世纪以来，后现代、前现代的文化表征，始终与现代性纠缠在一起，以其杂糅和并置的特殊形态，造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启蒙叙事”的无法完成与内在分裂，“提前”预支了“生活现代性”诉求与“启蒙精神性”之间的分裂与对立。这一方面使得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之间，总是存在着精神性与物质性的冲突；另一方面也使得“生活现代性”，在中国的语境下，具有了脱离启蒙范畴，进行独立研究的价值与意义。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地理差异大、未完成统一、人均收入低、物质现代化与自由民主的精神现代化都急需提高的传统大国，我们的现代性之路，并不是“已经终结”，或以反现代性的审美特质，来替代现代性本身的发育。在更多情况下，“扭结”与“杂糅”，“悖论冲突”与“新的肌质的生成”，则是中国新生活现代性的复杂生成的真实表达。而与启蒙叙事、民族国家叙事之间，扯不断、理还乱的联系，也使得新世纪文学的新生活现代性，在新的现代性整合建构与不断的解构之中，处于艰难的生成状态。

这一点，在21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中，表现尤为明显。现代性的启蒙色彩、国家民族性与“新生活现代性”，应该是一个互相“扭结”、逐步融合，并逐渐树立自己独特的“中国特质”的过程。这既是中国“后发现代”的历史境遇所决定的，也是中国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独特文化体验所决定的。《秦腔》、《额尔古纳河右岸》、《受活》、《檀香刑》等纯文学作品，更为注重鸿篇巨制的史诗想象、对国家民族历史的宏观理性把握，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型，以及对人性化、个性化视角的深化理

解。这也使得中国现代性的品格更为成熟与独立，在现代/传统的时间重塑上，在以本土化为核心的空间地理的塑形上，都更为开阔、宽广、大气。而主旋律文学经过90年代的发育，在新世纪则出现了更为成熟的作品，《国家干部》、《至高利益》、《省委书记》、《大法官》、《亮剑》等一大批作品的涌现，使得革命叙事、民族国家叙事与世俗的新生活现代性叙事之间，取得了一个相互交汇的“中间地带”，并以其话语的驳杂和宏大叙事的杂糅状态，溢出批评家的话语体系。而新世纪以来，打工文学、80后青春文学、新左翼文学等文学流派的凸现，也表明了现代性逻辑下的个性化多元思维也在进一步发育。同时，更令人关注的，则是网络文学的兴起，一方面，网络文学满足了现代性的个性化表达的需求，使得个体的、欲望的“新生活”诉求，有了合法的宣泄渠道；另一方面，常被批评家们忽视的是，作为一种通俗性文化，网络文学的新生活现代性，则表现出一定的“宏大叙事”色彩，即个性化、欲望化的表述与民族国家叙事的结合，在《兽血沸腾》、《若星汉的天空》、《边戎》、《历史的尘埃》、《亵渎》、《窃明》、《血荐中华》等玄幻、穿越等类型化小说中，都有非常明显的体现，一个文明、民主、自由、强大的“中国形象”，使得新生活现代性，结合着启蒙、民族国家叙事的诉求，在通俗文艺的不经意表达中，展现出巨大的现实合法性。

同时，在对中国生活现代性，寄以希望和充分肯定时，我们也要警惕，在话语杂糅的语境下，新生活现代性，本身的畸变和扭曲。由于中国的当代文化语境，“提前预支”了物质欲望与精神启蒙的内在分裂，也提前预支了西方消费社会的“物质病”，从而使得启蒙的发育，始终处于不完善的境地（而不是过分成熟）。而中国未成熟的市场经济，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妥协，规避了自由民主的诉求，诚如很多有识的文艺家所忧虑的，确实对文学造成了双重伤害，甚至使得新生活现代性中的世俗个体书写成了一种“没有抱负”的欲望书写。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形态，并且受到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① 在经济领域，经济权力

^① 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

不仅建构了高雅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二元区隔，以经济资本的宏观调控从外部左右文学场的文学生产，而且，还通过它的代理人即大众媒介浸入文学场内部，通过将受制于市场强制和媒介需求的通俗文学的成功模式设定为普遍原则，僭称自己才是文学场的合法标准。正如有的学者深刻地指出：“经济权力对文学的谋杀，其成功之处在于文学的死亡看上去不是一种他杀，而是一种自杀。”^①而作为一种弱化的意识形态，文学权力，无法在对主流意识形态、市场经济的抗衡中，取得真正的自我独立性，而只能成为二者表达意愿的领域。这种附庸性，在90年代市场经济还很大程度受到主流意识形态操控的情况下，表现得尤为突出，也给生活现代性，造成很大的困扰^②。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场域中，市场经济的发育，本身就受到诸多限制，而市场经济在价值选择上的暧昧性，削弱了其个体性诉求，也让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结合，日益显示出一种“市场专制主义”（弗朗西斯·福山语）的伪宏大叙事（例如余华的小说《兄弟》）。而作为一种弱化的文化符号资本，文学的地位更脆弱。为与影视、报纸等更新的表征方式相抗衡，取得符号信誉，文学生产不得不被经济权力划分成高雅与通俗两个区隔。而为获得市场认可，文学则不得不在通俗中解构自身，归类于新闻似的“故事消费”，取消启蒙文学的总体性、深度性表达世界的宏大愿望。这种物质思维对启蒙叙事的伤害，也值得深思，特别是生活现代性，如完全脱离启蒙的指引，就有自我迷失的危险。90年代至今，小说创作中出现的小说低俗化、庸俗化、崇拜权力和资本专制的倾向，恰恰是因为世俗化的过程，失去了启蒙个性解放理念的支持，在主流意识形态和市场经济的引诱与规训之下，“无法完成自我”的表现。这些，都是我们在思考生活现代性意义的时候，应该注意的问题。

① 朱国华：《文学与权力——文学合法性的批判性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② 如汪晖指出：“大众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的相互渗透并占据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转引自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

第一章 新世纪文学的内在文化逻辑

第一节 生成语境：文学的经典化及其困境

—

文学经典化，是如今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之一，而当代文学是否可以经典化，则争议更加激烈。从本质主义论的视角出发，很多学者认为，当代文学缺乏永恒性的文学经典标高，特别是不具备文学经典的教化品质和史诗品质。而从文学史的角度，很多人则认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悖论关系，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作为当下还在发生的文学，很难得到经典化命名：“现时以其不同于先前的变化，而走出先前的历史，并成为现时，现时是生成中的历史。因此，它所作的历史描述也只能是生成着的描述，亦即非历史描述，现时假借历史名义进行的任何历史描述都不具有历史可靠性。但问题又在于，历史并不现时地描述自己，任何历史的现时描述只能是现时的，亦即非历史可靠性的，这就形成现时与历史的断代。”^① 针对这些观点，一些学者和作家提出了不同看法。学者陈晓明认为，当代文学创新能力很强，而中国当下文学创作，正处于“大器晚成”的佳境^②。而学者吴义勤认为，我们评判当代文学，多从非文学因素入手，导致了“从灵魂、精神、道德、世界观角度审判文学，与从游戏化、娱乐化的角度来‘妖魔化’文学，成为一种殊途同归的文学‘谋杀’方式，它使得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被严重扭曲与改写”，并不无忧虑地指出：“90年代以来，我们看到，对中国当代

① 高楠：《文学经典的危言与大众趣味权力化》，《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

② 陈晓明：《幸存与“渐入佳境”——对当代文学现状及可能性的思考》，《文艺报》2009年8月20日。

文学的否定变得越来越轻率、容易、理直气壮，对文学的肯定则越来越轻微而不自信。但无论是肯定与否，基本上都告别了‘文学性’的尺度，是纯粹道德、精神、伦理话语的狂欢。”^①

无疑，无论是反对或赞成，这些观点，都有着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文化背景。而这些观点，都在逼迫着我们持续思考一些由此而衍生出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纯文学的经典标准和政治的文学经典命名之间会产生无法沟通的隔阂与冲突？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有关纯文学经典的热烈想象，会变成一次无疾而终的“文化梦呓”？为什么“中国的文学评判标准不是有机性的，而是随机的、割裂式的，没有形成兼容不同形态、不同诉求、不同审美理想的综合性的标准体系，总是或左或右，以偏赅全，从不同角度、不同局部、不同理念出发完成对其他文学形态或整体文学状况的判断”？

二

通常而言，由于出场和命名方式不同，文学经典的指认，被我们分为政治认定、文学精英认定、大众认可，以及滞后命名、即时命名、多次命名等不同种类。然而，这些对文学经典的指认标准，是否可以通约呢？有的批评家不无悲观地认为，尽管从一个特定的长时间段来考察，文学经典的确认，有历史连续性，然而，“姑且不论这种想象的重建是否可能，即使有可能复原某经典，得以经典化的每个过程——也就是如果有可能复原权威批评家的赞词、被选人各种选本的次数与时间、与其相关的当时的和以后的文学圈的复杂景观，思想的、道德的、美学的种种价值观的变化，种种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等历史条件的影响，那么，我们也可以基本断定，在任何两个经典之间寻找共同的经典化构成因子几乎是不可能的。”^②如果我们除去这些文学标准建构的权力结盟因素，那么，我们依然可以找到当代文学在历史连续性中，很难形成“共生共融”性经典标准的一些内在线索。这些线索，无疑都与中国20世纪以来艰难复杂的历史境遇有关联。

其实，文学的经典化过程，往往伴随着文学权力的确认方式。古代

① 吴义勤：《“文学性”的遗忘与当代文学评价问题》，《文艺报》2009年8月27日。

② 朱国华：《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

文学经典的确认，常常表现在作品和作者与统治者的思维方式结合，在不断对传统的追认和阐释中，创造一种缺乏对立面的“话语霸权”，例如，中国的儒家化文学与西方的圣经文学，而审美性强的文学作品，常被作为补充性的“娱乐方式”存在，例如，宋词在宋代的演变，古典白话小说在清代的地位。而人类进入现代性文明后，文学经典化，则利用雅俗分峙，造成话语权力的两极化。一方面，文学通过稀缺性，利用对“纯文学性”的追求，在话语符号的小众化和难度展示中，形成对政治和经济权力的话语优势；另一方面，文学则通过通俗性，与政治和经济话语形成有限度的妥协和结盟。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雅”或“俗”的作品，都能由于其不同的艺术审美属性和社会属性，获得不同的认可形式，进而成为不同类型的经典。比如，鲁迅的小说是“雅”的经典，而无名氏的通俗小说也可以成为“俗”的经典。而随着人类进入后现代社会，政府权威与经济权威的结合日益紧密，电视、电影和网络媒介也不断分享文学话语所指的形象表意性，文学越来越难以保持原有的符号权威性了。于是，雅与俗的界限，也就变得暧昧模糊。文学生产者、文学接受者、文学的生产组织者——出版商、政府文学创作机构，以及文学的监督制造体者——由大学、专业评论家、传媒、政府文学评价机构，共同组成了经典确认体制，都在利用文学经典标准的“滑动性”，取得更大的“话语利润”。当然，这个过程也更为开放、宽容。如金庸武侠小说的接受史，从报纸连载到大规模出版，一直到走入大学课堂，成为专家学者严肃的研究课题和文学史经典。

然而，当代文学经典化的难度与困境就在于，就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前史”而言，文学从没有获得真正权威的话语独立性。朱国华在《文学与权力——文学批判性的合法考察》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于，大众媒介时代的姗姗来迟……其次，一般说来，每一种文学观念都会承受文学社会共同体之外的语境压力，而对20世纪中国文学而言，这种压力超出了任何一种文学企图建立独立性话语系统所能接受的限度。”^① 由于启蒙与救亡的焦虑，

^① 朱国华：《文学与权力——文学批判性的合法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8—89页。

大众传播的不发达,现代小说,从它在中国的诞生之初,便被赋予了沉重的政治使命。这种情况,一直压抑着文学追求自主性的冲动,并持续到当代文学开始。伴随着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红色革命叙事开始解体,大众传媒发育迅猛,个性化和多元化开始逐渐被人们接受,文学似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争论,先锋小说的流行,都体现着社会追求文学自主性的要求。可是,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悖论在于,其现代性发育阶段太短,就“半被迫”地涌入了世界范围内的后现代主义浪潮。更为复杂的问题在于,前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并置”地出现在了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化语境^①中。原有的红色革命叙事并没有彻底解体,而是试图通过对民族国家叙事、启蒙叙事的整合,通过与经济权力的妥协,继续形成新的“宏大叙事”。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权威性的话语独立性尚未建立,便被抛入了市场经济大潮,不得不成为政治意志新的仆从,或沦为文化市场的文字制造者。文学的自主性无法实现,而政治和经济的权威却在日益增长。而就纯文学性本身而言,“后发现代”的焦虑,也没有因为革命神话的坍塌而缓解,反而变本加厉,甚至忽略了小说在纯文学的审美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发育和培养。在“怎么写”的口号之中,文学自主性的要求,片面提倡审美难度,绕过严峻的前现代现实生存环境,不但没有培养出保守的文化精英情结,反而成为浮躁功利的“话语圈地运动”。当代文学在短短几十年内,半生不熟地操练了世界文学近几百年来文学观念和技巧方式。由此,文学的被统治地位,也就更为明显^②,而随之而来的各种话语在文学场域中的发言权的扩张与交锋,也就变得更缠绕不清,政治意义的经典、纯文学意义的经典,畅销书类的经典,都在喧闹的叫卖声中,时而争夺与对抗,时而结盟或妥协,难以形成良性沟通机制。

三

于是,当代文学经典化的难度与困境,其深层次的表现形态和文

① 丁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同步渗透中的文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② 布迪厄认为:“文学生产场在权力场中占据的是被统治者地位……他们拥有权力,并由大量占有文化资本而被授予某种特权,就这方面而言,他们具有统治性;但作家和艺术家,相对于那些拥有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人来说又是被统治者”。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

化根由，也就呼之欲出了。一是“自卑焦虑”与“阴影症候”。后发现代的民族文化境遇，在悖论化的文化语境中，形成了不恰当的文学“影响的焦虑”，进而导致“文化自卑”。而当代文学以来，文学权力的丧失，文学自主性的沦落，都使得对当代文学经典的命名，始终躲在其他时空段经典命名的“阴影”之中，缺乏适当的信心和勇气——这种不自信，表面上既是对古代中国的文学经典，也是对外国的文学经典，更是对现代文学的经典，而就深层次而言，则既是由于后发现代的境遇所造成，也是由于文学权威的衰退，使得各种话语力量在文学场中的博弈，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和稳定的格局。这些情况，也造成了我们对世界文学中中国文学经典地位的确认，缺乏通约性。比如对80后小说，一方面，文化市场通过代际定位，试图谋求利润的企图昭然若揭，而纯文学界对经典的焦虑，也暗中迎合了这种想象的共谋；另一方面，学术精英和文学史家，却对这些特有的中国文学现象，保持持续的冷漠与忽视，拒绝对其进行认真研究和宽容的引导。而对于网络小说，在那些经济推手的后面，一方面，沉溺于低俗化和反智化的文字娱乐消费；另一方面，则负载着对政治现实的规避和民族国家叙事的畸形夸张，窒息了新的传播媒介所带来的文学活力。这些自卑的焦虑和阴影症候，不但影响了小说创作的审美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实现，而且制约着小说的评价体系，使得经典的标准无法通约，甚至出现很大的争议和断裂。例如，对于王小波的小说，尽管受众和市场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但由于其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他始终不能在当代文学中成为合法化的权威。

二是无法通约的悖论性冲突。我们看到，在文学场域之中，由于文化悖论造成的文化观念的错位扭结，多元的文化碎片，在暧昧的整合中，不断试图导致新的宏大叙事的艰难生成。而不同的文学经典标准，不但无法通约，且常常形成激烈冲突。文学史的经典标准，与大众文化的经典标准，官方意识形态经典标准之间，形成断裂和互相遮蔽。例如，卫慧的小说《上海宝贝》，曾以破坏性的女性欲望展示，成为一个中国症候的文化表征。她对欲望尺度的突破，甚至导致了官方意识形态激烈的禁书举措。而在目前的出版环境中，政治权威性甚至大于经济权威性，它对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主旋律作品的经典化努力，却常常遭到提倡

纯文学自主性的文学史界虚与委蛇的抵抗。

三是正由于以上特殊表现形态，造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的标准、命名，与世界文学的隔阂。而反过来，这种隔阂，也加深了当代文学经典化的难度。很多外国专家学者，无法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形态，而中国作家，对经典化问题，也较少理性的反思和清醒的自信。这种隔阂，比较明显地表现在近些年来几次文学事件中。例如，2006 年底，德国汉学家顾彬，抛出“中国文学垃圾论”，强烈地刺激了中国作家的神经，引发了拥护和批判的不同反响的激烈交锋。不管顾彬的经典化标准背后，是否有着意识形态的影响，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顾彬的立场，有着纯文学的精英化倾向，而这种倾向，既挑战了中国作家的民族自尊心，又与国内对当代文学的政治化和市场化经典标准对立。2009 年底，著名作家王蒙，参加德国的法兰克福书展，在法兰克福文学馆举行演讲时称“中国文学发展很快，读者的口味发展得也很快，但不管对中国文学有多少指责，我只能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同样也引发了国内外有关中国当代文学是否能经典化的争论。

由此，我们看到，正是由于中国悖论化的文化语境，使得文学经典生产机制，变得歧义丛生、无法通约、冲突激烈。无论是当代文学内部经典化的审美属性、社会属性的培育，还是外部生产环境对当代文学的经典化的确认方式，都变得困难重重。而在这些困境背后，则是文学权力在当下文化悖论语境下奇怪的发育状态。一方面，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依然具有非常强的功利色彩和“被赋予”的话语强势；另一方面，当代文学的文学符号权威性，却不断地丧失。文学在政治活动中，丧失了启蒙的指导性，沦为歌功颂德的工具，在经济活动中，则丧失了主动性，变成了恶俗的工具。同时，更令人忧虑的是，这种不断的退缩，使得文学的自信衰落，表现为极端的非理性心态，或盲目贬低，或盲目推崇，不但忽略了文学内部经典标准的调整和文学重读的能力建构，同时，也对新的作家和作品，没有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当然，在这种困境之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专家和学者持续不断地建构努力。吴义勤教授致力于在“建设纯文学自主性”的基础上，进行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可以说是切中当下时弊，而由很多专家学者共同发起的“当代文学资料汇编”、“当代文学重读”等活动，则不仅是“后批评”，还是“再叙述”或“再